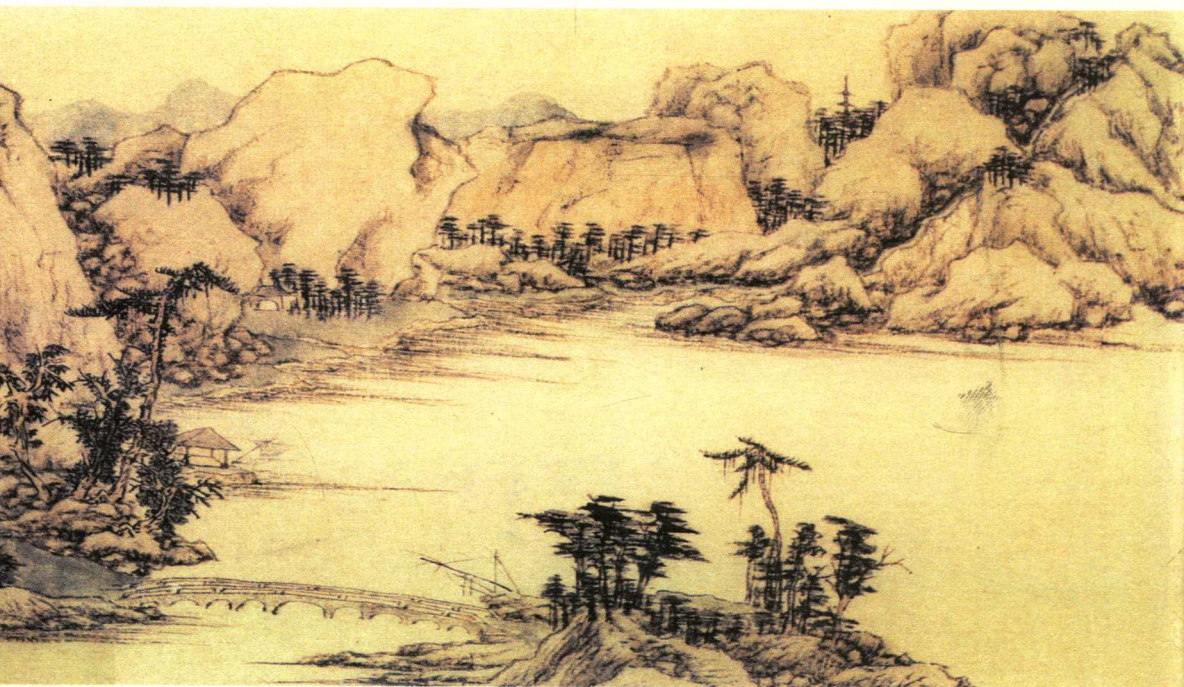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文学论丛

古代文献与文学探论

孙维城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献学与古代文学论丛

古代文献与文学探论

孙维城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文献与文学探论 / 孙维城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664-0343-8

I. ①古... II. ①孙... III. ①古文学—文集
②中国文学:古典文学—文集 IV. ①G256—53 ②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4823 号

古代文献与文学探论

孙维城 著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刷: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170mm×230mm

印张:9.75

字数:175千字

版次:2012年1月第1版

印次: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6.00元

ISBN 978-7-5664-0343-8

责任编辑:王娟娟

装帧设计:孟献辉

责任印制:陈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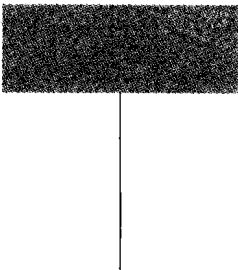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551—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0551—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551—5106311



目 录

考 证

孟浩然入京事迹考·····	1
孟浩然三人长安考·····	7
清季四大词人生平考实·····	13

古代文学研究

古代诗歌“思乡”情结的人生意蕴·····	29
论“登高望远”意象的生命内涵·····	36
“黑云压城城欲摧”试解·····	45

词学研究

文坛三气与宋词三派·····	49
一则有关苏轼词学观的词话辨析·····	57
“秀气胜韵,得之天然” ——晏几道词艺术分析·····	64

陆游:南北宋词坛的承启人物

——兼论陆游三类词的艺术成就 75

况周颐美学思想的困惑与演进 85

论况周颐对王鹏运“重拙大”词学观的改造 93

桐城派研究

桐城派马其昶文集版本琐议 101

马其昶墓志、寿序文浅评 108

桐城派后期文章的现代演变

——以现代性解剖马其昶《抱润轩文集》 116

序 评

《迎翠楼诗词》序 127

《晚清三大词话研究》自序 129

《贺涛选集》前言 130

《马其昶著作三种》点校说明 137

全面精深 探赜发蕴

——评《词学渊粹——况周颐〈蕙风词话〉研究》 140

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评《词学的星空——20世纪词学名家传》 143

简评邓乔彬先生《唐宋词艺术发展史》 147

后 记 152



考 证

孟浩然入京事迹考

关于唐代诗人孟浩然入京事迹,过去研究者多持一次入京说。其根据乃在新旧《唐书·孟浩然传》,殆未深考。

笔者认为:新旧《唐书》对孟浩然入京事迹的说法并不一致。说孟旅京一次的误会来自稍晚出的《新唐书》。《新唐书·孟浩然传》称孟“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于太学赋诗”。这句话实源出《旧唐书》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下简称《王序》)而略。《旧唐书·孟浩然传》云:“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乃是说孟四十岁时来京应举不第,并非谓孟一生只来过一次京师,或四十岁前未来过京师。《新唐书》称“乃游京师”与《旧唐书》云“来游京师”,虽一字之差,却差之千里,变成了孟到四十岁才游京师。这一改动实在太不高明,弄得似是而非;后人不察,以讹传讹,遂谓孟一生只游过一次京师。

近来不少研究者已注意到一次入京说的难以自圆,转而主张二次入京说,然持论尚不能称周密。最近发表的屈光同志的《孟浩然首次入京考》认为,“浩然一生曾两次入京求仕,首次于开元八年左右,时浩然三十二岁上下。二次入京于开元二十年冬十二月或二十一年春正月,时浩然四十四或四十五岁。”^[1]推翻了孟四十岁入京的说法。然所论孟两次入京时间所据资料难称充允,推论未免武断,尚可商榷。

整理孟浩然文集并为之作序的王士源乃天宝时人,所著《孟浩然集序》当为研究孟生平事迹之最原始资料;据《王序》记载:孟浩然在京“间游秘省”,并

与张九龄、王维等结为忘年之交。从《王序》可知，张九龄此时正在秘书省任职。考张九龄《曲江集》所附《诰命》：张九龄开元十九年（731）三月七日由桂州刺史入为秘书少监，开元二十年（732）转工部侍郎，同年八月二十日知制诰。张、孟定交于秘省时间即张任秘书少监时间，大致可定为开元十九年三月到开元二十年八月之间。屈文称孟二次入京时间为开元二十年十二月或二十一年正月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

笔者认为孟此次入京正是《旧唐书》所称“年四十，来游京师”的一次。但按一般说法，孟浩然卒于开元二十八年（740），终年五十有二，则其四十岁游京正值开元十六年（728）。在京留滞到十九年才得见张九龄于秘省，时间太长，亦不可能。考孟浩然集有多种版本，流传至今最早版本为北京图书馆馆藏宋蜀本《孟浩然诗集》。此本离原本最近，且元代藏翰林国史馆，世人罕见，改窜最少，故最可靠。此本《王序》谓孟“终于南园，年五十，有子仪甫”。宋计有功《唐诗纪事》记载与《王序》同。据此，则孟浩然终年实为五十岁。而据明刻本重印的中华书局本《孟襄阳集》与商务印书馆本《孟浩然集》皆云：“年五十有二子曰仪甫。”这句话本无断句，毛病即出此。可以断为“年五十有二，子曰仪甫”；亦可断为“年五十，有二子曰仪甫”。从断句看，“年五十有二，子曰仪甫”比较通畅，后人皆如此断句。但从宋蜀本看，并无“二”、“曰”两字，当为传抄者所加，画蛇添足，遂成疑案。今天应据宋蜀本定孟浩然享“年五十”。这样，他四十岁时，正值开元十八年（730），游京赴举，十九年（731）“间游秘省”，与张九龄相遇，斯为切合。

关于孟浩然在四十岁以前的一次入京时间，傅璇琮同志认为：“新旧唐书说孟浩然年四十乃游京师，不一定确实。孟有《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诗（《孟浩然集》卷二），根据有关史料，可考知此袁左丞当为袁仁敬，贺侍郎当为贺知章。《元和姓纂》卷四、《旧唐书》卷九十九《张九龄传》都提到袁仁敬为尚书左丞。贺知章则开元十三年为礼部侍郎，十四年为工部侍郎，旋即为太子宾客。由此看来，孟浩然应在开元十六年前即已赴长安。”^[2]

傅文所据的“有关史料”^[3]不过说明了开元时期袁仁敬任过尚书左丞，贺知章任过侍郎，实在不足以证明《秦中苦雨思归》诗提到的袁、贺即袁仁敬、贺知章，而一次入京说，也无法解释孟与张九龄交往于秘省之事。但是傅文从《秦中苦雨思归》一诗所提出的问题，却为二次入京说提供了切实的依据。笔者认为《秦中苦雨思归》一诗既交代了作诗时孟的年龄范围，又交代了地点为长安，且有人物袁、贺辈及其职务，如参之以切实的史料，就可以考证出孟此次入京的大致时间。兹引录全诗如下：

为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明扬逢圣代，羁旅属秋霖。岂直昏垫苦，亦为权势沉。二毛催白发，百镒罄黄金。泪忆岷山堕，愁怀湘水深。谢公积愤懣，庄舄空谣吟。跃马非吾事，狎鸥真我心。寄言当路者，去矣北山岑。

屈光同志在《孟浩然首次入京考》中对傅的论点加以驳斥，提出的证据并不充分。而且仅据孟诗《田园作》、《秦中苦雨思归》、《自洛之越》、《书怀贻京邑故人》中有关孟年龄的说明即贸然推证孟三十二岁左右即开元八年(720)左右入京。仅仅以诗来证史，其准确性大可怀疑。这几首诗中所出现的有关孟年龄的记载尚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田园作》云：“三十犹未遇。”确为三十岁左右尚未入京时作。

《秦中苦雨思归》有“为学三十载”、“二毛催白发”等句，是否即指三十二岁左右？屈文又举《自洛之越》诗“遑遑三十载”句相印证。我们认为这儿的“三十载”应指三十五、六岁。古人五六岁读书，孟浩然“少小学书剑”（《伤岷山云表观主》），到三十五、六岁，正好是“为学三十载”。可举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中“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为证。据《少陵先生年谱》，此诗作于天宝七年(748)，时杜甫亦三十六岁。再看“二毛催白发”句。“二毛”典出潘岳“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见二毛”。屈文即据此定孟此时三十二岁。但“二毛催白发”不等于“二毛”。孟诗还有“白发催年老”句，与此句式相同，都是动态地写年龄变化。“二毛催白发”即指自己从三十二岁左右出现二毛后，又随年龄增长，添出白发来了，因此白发似为二毛催出来的。可知此时为三十二岁后二三年，即三十五岁左右。孟另有一首诗《晚春卧病寄张八》，为隐居家乡时作。诗中有句“贾谊才空逸，安仁鬓欲丝”，才真正是作者三十二岁左右时的作品。这句诗与“二毛催白发”句表示出的年龄实有很大差异，说明这两首诗不是同一两年内的作品，《秦中苦雨思归》诗写在三十一、二岁以后。

屈文又举《书怀贻京邑故人》诗说：“曰‘遂弹冠’、曰‘京邑故人’，知入京已属事实。曰‘秦楚邈离异’，知为自京回归襄阳故里后作。而‘三十既成立’则交代了入京时年龄为三十多岁。”屈文误解了“遂弹冠”典故的含义。《汉书·王吉传》注：“弹冠者，且入仕也。”这表现孟此时因知己在当途而急于自试的心情，并非说孟已入京求试过了。曰“京邑故人”、“秦楚邈离异”也可是故人在京邑，自己在襄阳，不能说明孟入京已成事实。此诗是孟三十多岁入京前的作品。如依屈文说成首次入京、失败归来后的作品，怎么又在诗中投刺求荐，而且表现得如此急不可耐呢？

屈文针对《秦中苦雨思归》一诗，引用不少史料来证明袁仁敬开元十三年

(725)到十五年(727)不可能为尚书左丞;但又不加任何考证地将此诗定为开元八年(720)到十一年(723)孟首次入京时的作品,这是很不严谨的。笔者认为,切实地考证出该诗写作年代是确证孟首次入京时间的关键,故考证如下:

六年,玄宗又敕吏部侍郎兼侍中宋璟、中书侍郎苏頌、尚书左丞卢从愿……等九人删定律令格式,至七年三月奏上。律令式仍旧名,格曰开元后格。《旧唐书·刑法志》

(卢从愿)入为工部侍郎、转尚书左丞。又与……礼部侍郎王丘、中书舍人刘令植删定开元后格,迁中书侍郎。《旧唐书·卢从愿传》

可知卢从愿开元六年——七年三月间曾任尚书左丞,时王丘为侍郎,卢不久迁中书侍郎。

(王丘)开元初,累迁考功员外郎……再转吏部侍郎……俄换尚书左丞。十一年,拜黄门侍郎。《旧唐书·王丘传》

此记王丘为吏部侍郎与《卢从愿传》所记小有差异,但为侍郎无疑。且此时(开元六——七年)参与删定《开元后格》。“俄换尚书左丞”,似为接卢从愿职。十一年(723)拜黄门侍郎,故其任左丞在十一年前,约在开元八、九年间。

(源光裕)初为中书舍人……同删定开元新格。历刑部、吏部二侍郎,尚书左丞。《旧唐书·源乾曜传附光裕传》

(开元十三年二月)上自选诸司长官有声望者大理卿源光裕……等十一人为刺史。《资治通鉴》

可知光裕开元六、七年亦参与删定《开元后格》(传谓开元新格,误),开元十三年(725)二月前已任大理卿,而任左丞在大理卿前,刑、吏二侍郎后。假令任侍郎在开元八、九年,则任左丞时间为开元十年(722),(十一年为萧嵩,后有杨承令,已为屈文所证)正在王丘任左丞后,亦可推定王丘任左丞时间约为开元八、九年间。

据《旧唐书·职官志》,尚书省设左、右丞各一人,从上引史料已知开元七(719)至十一年(723)间任左丞者有卢、王、源、萧四人。此期间无甚大事(如选京官外放等),四人又无丁丧事宜及贬黜事由,只依常例升迁,可断定此一时期无其他人插入任尚书左丞。因而孟诗《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绝非开元十一年前的作品。据此,屈文所持孟开元八年至十年间入京说就难以立足了。

另外,屈文说“任尚书左丞者,开元十一年十一月为萧嵩,十三年二月前为

杨承令，十三年十一月后为王丘，而开元十三年二月后袁仁敬任杭州刺史。就现有材料来说，傅文认为开元十三——十五年袁仁敬为尚书左丞是无根据的。”

此说看似严密，实际只讲了上限“十三年十一月后为王丘”，而无下限。考《旧唐书·王丘传》：“（王丘）入为尚书左丞，丁父忧去职。服阙，拜右散骑常侍。”可知王任尚书左丞时间并不长，他丁忧去职后，这一职务即出缺，袁可接任。

屈文又谓袁即使任尚书左丞亦应随驾东都，并说：“考《旧唐书》、《新唐书》玄宗纪及《通鉴》，知开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至十五年冬十月唐玄宗举驾幸东都。宰相、诸王、诸司长官、台郎、御史等‘群臣’、‘百官’随驾。”以此证明袁亦随驾东都。可是这一引证并不确切，实际是把《通鉴》两处所记史实拼凑起来的。考《通鉴》：

（开元十二年）十一月，庚午，上幸东都；戊寅，至东都。

（十三年二月）上自选诸司长官……为刺史，命宰相、诸王及诸司长官、台郎、御史饯于洛滨，供张甚盛。

笔者以为：东都亦有分司官，玄宗东幸，随驾虽有不少人臣，却不必倾巢出动。百官“饯于洛滨”不可即认为百官皆随驾。据此，袁、贺辈亦可在长安。

另外，《秦中苦雨思归》诗中提到的“贺侍郎”，傅文指为贺知章，尚可找到一有趣旁证：中唐诗人张祜经历颇类孟浩然，他亦十分钦敬孟，曾称“襄阳属浩然”，^[4]当时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曾荐举他，在京供职的诗人刘禹锡亦从旁揄扬，但迄未成功。事后张写诗赠刘，并以自况。诗中有句云：

天子好文才自薄，诸侯力荐命犹奇。

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更不疑。^[5]

诗中的“诸侯”显指令狐楚，而以贺、孟对举，以孟自况，以贺属刘。我们认为这里正述说了孟入京赴荐时一段公案。考卞孝萱《刘禹锡年谱》，时刘任礼部郎中兼集贤学士，其职务正与贺开元十三年之职务——礼部侍郎兼集贤学士相类。可证贺知章曾多次揄扬过孟浩然。

综合上述对开元八年至十一年任尚书左丞者的考证及屈文对开元十一年至十三年任左丞者的考证，开元十三年前并无所谓袁左丞其人。因此《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诗必为开元十三年后之作品。又据诗中标举的诗人年龄看，只能是诗人三十五、六岁前后的作品。按我们对孟终年五十的考证，此诗写作不可能超过开元十六、七年（时孟三十八、九岁）。故可大致确定，孟

浩然约在开元十三年至十五年间游历长安,《秦中苦雨思归》诗约写于开元十四、五年间。诗中提到的袁左丞、贺侍郎很可能如傅璇琮同志推测的那样,是袁仁敬、贺知章;不过,是不是此二人,并不影响我们的推断及结论。

孟浩然此次入京目的,笔者认为不是应举,而是献赋。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尤其在他们的青年时代,总想布衣干明主,一举立不世之功。高适、李白等人都如此,孟浩然亦如此,《田园作》称:“冲天羨鸿鹄,争食羞鸡鹜……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题长安主人壁》云:“欲随平子去,犹未献甘泉。”都是寄托君臣际会,遇合风云之意。

这次入京,可能是有人举荐他。此时他在京都亦有几个知己。“当途诉知己,投刺匪求蒙”(《书怀贻京邑故人》)。这当途知己,从《秦中苦雨思归》诗知有袁左丞、贺侍郎。另外,可能还有张说。《唐诗纪事》载:“明皇以张说之荐召浩然,令诵所作。乃诵‘北阙休上书……’。”所记类似《新唐书》记王维荐孟于明皇事,显属小说家言。但张说其人大可重视,张说荐孟浩然也很可能。据《册府元龟》载:“(开元)六年二月……张说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孟故里襄阳离荆州很近,孟一生曾在荆襄与地方官韩朝宗父子、张九龄等交游,也可能与张说交往。开元十三年(725),张说任中书令,亦可能向玄宗推荐“文士知名者”^[6]孟浩然。前举《秦中苦雨思归》诗中提到的袁、贺二人如果正是袁仁敬、贺知章,此二人亦可能向张说揄扬孟浩然。贺知章曾得张说荐引任集贤学士;而袁仁敬与张九龄“交道终始不渝”,^[7]张九龄又最受张说亲重,因此袁仁敬与张说亦可能交道匪浅。有可能孟写《秦中苦雨思归》诗呈袁、贺,正是要他们转达张说。按张说开元十四年(726)罢相,十五年(727)致仕。孟此次入京不达,是否即与此有关?诗中云“岂直昏垫苦,亦为权势沉”,是否即指此事?另孟诗《题长安主人壁》称自己“叨陪东阁贤”。典出汉代公孙弘为相,开东阁以延纳贤士,后遂以东阁作为宰臣招致贤士之所。这样看来,孟所指的7,正是张说以中书令身份兼知院事的集贤院,而“东阁贤”正是指集贤学士贺知章等。《题长安主人壁》当为《秦中苦雨思归》同时期的作品。

关于张说荐孟浩然事,由于史料缺乏,不可肯定,作为一种可能,存之待考。

注释:

[1] 屈光:《孟浩然首次入京考》,《河南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

[2] 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117页注[5],中华书局1980年版。

[3] 参阅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文史》第8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4] 张祜：《题孟处士宅》，见《全唐诗》。

[5] 张祜：《寓怀寄苏州刘郎中》，见《全唐诗》。

[6] 《旧唐书·文苑下》。

[7] 《旧唐书·张九龄传》。

（原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孟浩然三人长安考

关于唐诗人孟浩然之入长安，以前人们多认为只有一次，近几年始有二次入京说。笔者曾著文考证孟浩然第一次入京在玄宗开元十三年（725）至十五年（727），所据在孟诗《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第二次入京在开元十八、九年，其根据在王士源《孟浩然集序》所叙孟与张九龄定交于秘书省事。详见拙文《孟浩然入京事迹考》（载《安徽师大学报》八三年第四期）。笔者愚见：孟浩然此后还有一次入京，否则，有些孟诗不好系年。孟有《岁暮归南山》诗云：“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显为从长安归来作品。“白发催年老”，可见年龄已大，与《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诗云“二毛催白发”年龄不同，绝非同时作品，因此非第一次入京返里之作。孟又有《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耆旧》诗云：“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亲。归来当炎夏，耕稼不及春。”全诗无一字言及游京以外之事，必为一次游京归来的作品。从诗中标举“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可知必为四十岁后之作，因不是首次归来之作（时诗人三十五、六岁）。此次归来当炎夏，与《岁暮归南山》“青阳逼岁除”节候不同，亦可证明非同时作品。由此可知孟之入京必不止两次，起码有三次。

其实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已明确指出：“山南采访使本郡守昌黎韩朝宗谓浩然间代清律，置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秦，与偕行。先扬于朝，与期约日引谒。及期，浩然会僚友文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诺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遂毕席不赴。由是间罢，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浩然与韩朝宗一起去了长安，“因入秦，与偕行”。

而韩“先扬于朝，与期约日引谒”，乃谓朝宗先在朝廷揄扬浩然，再约日引浩然谒见朝廷。但《新唐书·孟浩然传》却云：“采访使韩朝宗约浩然偕至京师，欲荐诸朝。会故人至，剧饮欢甚，或曰：‘君与韩公有期。’浩然叱曰：‘业已饮，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辞行，浩然不悔也。”据王序而过简，模棱两可，遂造成后人误会。陈贻焯先生《孟浩然事迹考辨》^[1]据此认为孟这次并未成行。

谭优学先生《孟浩然行止考实》^[2]认为浩然此次入秦已成事实，系之于孟二次入京，而考证孟此次入京的时间亦不确，兹引录谭文如下：

现在先弄清推荐浩然的“山南采访使本郡守韩朝宗”，那么，他们入秦的时间就可确定了。

《通鉴》开元四年：“二月，以尚书右丞倪若水为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访使。”胡注：“《唐会要》：‘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初置十道采访处置使。据此则先置采访使。二十二年，始置采访处置使也。’”又开元二十一年：“是岁分天下为京畿、都畿……山南东道……江南西道……凡十五道，各置采访使，以六条察举非法，两畿以中丞领之，余皆择贤刺史领之。”胡注：“山南东道治襄州。”所以开元二十一年以前，已分天下为十道，各置采访使。开元二十（孙按：此下似脱“一”字）年分天下为十五道，各置采访使。开元二十二年，乃初置十道采访处置使，故韩之为襄州刺史，山南采访使，至迟在开元二十一年。

谭文最主要立论根据在元人胡三省《通鉴》注中。胡三省认为唐代的采访使与采访处置使是两回事，先置采访使，开元二十二年（734）始置采访处置使。

考唐杜佑《通典·职官门》：“神龙二年分天下为十道，置巡察使二十人……至景云二年改置按察使，道各一人。开元十年省，十七年复置。二十二年改置采访处置使，理于所部之大郡。”再据《唐大诏令·置十道采访使敕》：“其天下诸道，宜依旧逐要便置使，令采访处置。”下署时间为“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与《唐会要》七八云：“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初置十道采访处置使”合起来考查，可知开元二十二年（734）置采访处置使是不错的。《唐会要》谓“初置”，笔者认为没有道理。《通典》所载原为“改置”，由开元十七年（729）的按察使改置采访处置使。“改”、“初”二字字形相近，当为“改置”之误写。

记载置使经过最详尽者当推《新唐书·百官志》。彼云：“神龙二年，以五品以上二十人为十道巡察使，按举州县，再周而代。景云二年，置都督二十四人……当时以为权重难制，罢之，唯四大都督府如故。置十道按察使，道各一人。开元二年，曰十道按察采访处置使，至四年罢，八年复置十道按察使，秋、

冬巡视州县，十年又罢。十七年复置十道、京都、两畿按察使，二十年采访处置使，分十五道。”其记：“二十年采访处置使”，显为二十二年之误。而所记详贍，且与《通典》相合，当为可信。其记“开元二年，曰置按察采访处置使，至四年罢”，正可说明《通鉴》所记开元四年倪若水为河南采访使之事。《旧唐书·职官志》并未论及置采访使（或曰采访处置使）事，当为一大缺憾。

综上所述，《通典·职官门》及《新唐书·百官志》皆记载了开元十七年（729）复置十道按察使，二十二年（734）改置采访处置使事，而没有二十一年（733）置采访使之记录。职官门志本为记载内外职官，所记又如此详贍，却无二十一年置采访使之事，足证其为非是。

胡三省注中所谓采访使与采访处置使之区别，并不见于史书。前据各书，已知开元二十二年置采访处置使。但是《通典·选举门》云：“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命诸道采访使考课官人善绩。”《通鉴》二十九年春，正月，“丁酉，制：……自今委州县长官与采访使量事给讫奏闻”。《旧唐书·玄宗纪》天宝十五载三月乙酉“以平原太守颜真卿为河北采访使”。各书在开元二十二年以后之称采访处置使仍为采访使。而《新唐书·韩朝宗传》更云：“开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采访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可见采访使即采访处置使之省文。此一见解亦见于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3]。

二十一年置采访使之说，始见于《旧唐书·地理志》：“开元二十一年，分天下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使，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职。”《新唐书·地理志》亦据旧地志云：“开元二十一年，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为东、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置十五采访使，检察如汉刺史之职。”《通鉴·玄宗纪》又依新旧地志记云：“是岁（孙按，指开元二十一年），分天下为……凡十五道，各置采访使，以六条检察非法。”

笔者认为，置使之说应依据《职官志》。《通典·职官门》、《新唐书·百官志》均并无二十一年置采访使之说，足证非是。而《地理志》所记乃在地理。新旧地志所记开元二十一年又因十道分天下为十五道之事是正确的，也是此条记载的中心内容。《通典·州郡门》前列十五采访理所，后又分述十五部，逐部用小字分注所管之郡，《新唐书·地理志》亦以十五道所辖叙次各州郡。独《旧唐书·地理志》分十道郡国，其中山西、江南又分东西。进退无据，颇遭物议。^[4]但是，各书皆认为开元全盛时期分天下为十五道，新旧地志系之于开元二十一年。此一说法是统一的。他书亦无异辞，如前引《通典·职官门》仅云置使，未言分道；《唐大诏令》亦如此（其置使敕令题目当为后人所拟）。我们认为，地志所记二十一年分十五道之事是可信的。至于置十五道采访使，地志所

记不确,宜依职官门志所记,以十七年之按察使为是。

综上所述,采访使即采访处置使之省文,开元二十一年分天下为十五道,仍旧置按察使,二十二年改置采访处置使,省称采访使。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山南采访使本郡守昌黎韩朝宗”云云,王序不是史笔,史书尚可省文,则王序省采访处置使为采访使便无可非议。由此可知谭文所考韩朝宗为襄州刺史山南采访使至迟为开元二十一年之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韩朝宗之荐孟当系于何年呢,考《新唐书·韩朝宗传》:韩“累迁荆州长史。开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采访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此一记载合于诸书所记,当为确实。因知朝宗偕浩然入秦时间在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任采访使后。这是上限。

又考《旧唐书·玄宗纪》:开元十八年闰六月“己丑,令范安及、韩朝宗就灋、洛水源疏决,置门以节水势。”十九年,“是冬,浚苑内洛水,六十余日而罢”。二十年六月“遣范安及于长安广花萼楼,筑夹城至芙蓉园”。据此知韩与范安及于十八年闰六月一起疏决东都灋、洛水源,十九年浚苑内洛水很可能亦以他二人为主,范二十年六月被派长安广花萼楼,则洛阳节水工程很可能到二十年六月结束,韩可能即于此时派任荆州长史。又据《通鉴》开元十八年六月下《考异》:“按《实录》,是岁闰六月‘以太子少保陆象先兼荆州长史。’”《旧唐书·玄宗纪》:二十一年夏四月丁巳,“命太子少保陆象先、户部尚书杜暹等七人往诸道宣慰赈给,及令黜陟官吏,疏决囚徒。”知陆象先开元十八年(730)任荆州长史,二十一年(733)四月前已解任回京任太子少保;则韩朝宗正是在陆解任时接任荆州长史的。两考互参,可知韩之任荆州长史时间当以开元二十年(732)六月稍后为最可能。

再考《曲江集·贬韩朝宗洪州刺史制》:“朝请大夫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判襄州刺史山南采访处置等使上柱国长山县开国伯韩朝宗亟登清要,爰委条察,宜恭尔职,以付朕怀,而乃私其所亲,请以为邑。未盈三载,已至两迁。”笔者认为,“未盈三载”,应指韩自任荆州长史时起,到开元二十二年兼判襄州刺史山南采访处置使后,前后在任不足三年。前已考证出韩任荆州长史时间约为开元二十年(732)六月稍后,则韩贬洪州刺史当在开元二十三年(735)上半年。

陈贻焮先生与谭优学先生对于韩朝宗之贬洪州时间,都认为应从韩二十二年(734)二月任采访使时算起,“未盈三载”,则贬洪当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底前。并据张九龄开元二十五年(737)四月贬荆州长史推断张九龄即为韩朝宗之后任。这一推断是错误的。事实是韩朝宗解任荆州后,张九龄贬荆州前,任荆州长史者乃宋鼎也。宋鼎新旧唐书无传。据《全唐诗》宋鼎诗《赠张丞相》

序云：“张丞相与予有孝廉校理之旧。又代余为荆州，余改汉阳，仍兼按使，巡至荆州，故有此赠。”此张丞相即张九龄也。《全唐诗》张九龄诗有《酬宋使君见赠之作》，有和宋鼎《赠张丞相》诗意。诗云：“罢归犹右职，待罪尚南荆。”可知为荆州长史时作。又云：“政有留棠旧，风因继组成。”可知张接宋鼎之职。而“高轩问疾苦，烝庶荷仁明”，正咏宋鼎“巡至荆州”之事。二人事迹，历历可考，可知：宋鼎为张九龄之前任。因此，韩朝宗之任职“未盈三载”，只能从开元二十年（732）六月稍后任荆州长史时算起，到开元二十三年（735）上半年止。宋鼎接任荆州长史到二十五（737）年四月张接任止。

孟浩然有诗《和宋太史北楼新亭》，“太史”一作“大使”。诗云：“返耕意未遂，日夕登城隅。谁道山林近，坐为符竹拘。丽谯非改作，轩槛是新图。远水自蟠冢，长云吞具区。愿随江燕贺，羞逐府僚趋。欲识狂歌者，丘园一竖儒。”诗谓“羞逐府僚趋”，太史是史官，在襄阳不可能有府僚趋奉，我们认为此“宋太史”当为宋大使，且此宋大使就是宋鼎。宋鼎《全唐诗》称其“明皇时为襄州刺史”。此诗云：“远水自蟠冢。”按汉水源出陕西蟠冢山，流经襄阳，东流至汉阳注入长江，可知此诗必作于襄阳。宋鼎此北楼新亭“丽谯非改作，轩槛是新图”，绝非一日之功，亦可证明宋在襄州刺史任内非止一年，其接任韩朝宗时间故必在二十四年（736）以前。孟此诗又云：“返耕意未遂，日夕登城限，谁道山林近，坐为符竹拘。”应该认为孟浩然此时是宋鼎之幕僚。如是清客之流，自如闲云野鹤去住自由，不会“返耕意未遂”。由此可知孟浩然在第三次入京归来后，曾任襄州刺史宋鼎之僚属；以后在张九龄接任荆州时，又任张之从事。但在宋鼎幕内，看来孟是不满意的，故才有“羞逐府僚趋”、“丘园一竖儒”之叹。

现在再回到孟浩然三入长安事上，韩朝宗入秦荐举浩然失败后，孟自然仍有可能独自留在长安。但时间是不长的，因前已考论韩之贬洪州当在开元二十三年（735）上半年。而孟有《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诗云：“岷首晨风送，江陵夜火迎。”考《元和郡县志》：山南道襄州襄阳县，岷山在县东南九里，山东临汉水，古今大道。《大清一统志》：湖北襄阳府，岷山在襄阳县南九里，一名岷首山。则孟此时已在襄阳，与缙绅一起别朝宗。朝宗清晨由襄阳出发，可夜至江陵。因此，浩然在开元二十三年（735）上半年已在襄阳。再据《岁暮归南山》诗知孟此次归襄时间应为二十二年（734）岁暮。其在长安时间即自本年二月二十日算起也不足一年。按我对浩然终年五十的推断，是年孟浩然四十四岁。

王士源序记叙孟浩然会文友甚欢，故不赴韩荐，此说虽十分抬举孟，却并不合于实际情况。从孟由秦返里后即任宋鼎僚属，后又任张九龄从事看，他此时是较热衷于为官的。绝不会放弃这一机会。《岁暮归南山》诗云：“北阙休上

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寻绎诗意，孟此次入秦是上书言事的，只是很不顺利，因而才悲叹“不才明主弃”，且有“多病故人疏”之慨，可知此次入京也曾夤缘在京做官故人，但并未获荐举。此一故人应包括张九龄。孟在《送丁大风进士赴举赠张九龄》诗中称张“故人今在位”。考《曲江集》所附《浩命》：张九龄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起复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十二年五月守中书令，正是任职宰相之时。但据《通鉴·玄宗纪》：玄宗开元二十二年春正月至东都，直至二十四年十月回西京。张九龄作为宰臣，基本上是任职东都的。也许即因此，孟无法在长安见到张九龄，更无法得见玄宗。总之，孟此次入京如同前两次一样，没有什么效果。

此次失败归来，诗人的情绪显然比前两次低落得多。《自洛之越》诗当为首次入京后之作品，浩然对自己不达愤愤不平：“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仲夏归汉南园》诗亦云：“予复何为者，栖栖徒问津……因声谢同列，吾慕颍阳真。”则二次失败归来后亦表现出穷则独善其身的达观态度与不亢不卑的姿态。然而《岁暮归南山》诗却慨叹头白岁晚而功业未建，因而“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很可能在三次失败的沉重打击下，诗人年龄也老了，已真切地感到应试或上书的路再也走不通了，但是入仕之念反更加强烈。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才屈就成了宋鼎、张九龄的幕僚，这在唐代是第三条仕进之途。

关于孟浩然此行归来之诗作，谭优学先生举出数首。我们认为其中《南南北北阻雪》一首比较可靠，但也尚值得推敲。诗云：“我行滞宛许，日夕望京豫。旷野莽茫茫，乡山在何处？孤烟村际起，归雁天边去。积雪覆平皋，饥鹰捉寒兔。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十上耻还家，裴回守归路。”此诗一题《南归阻雪》。谭文认为“从两题看，路程、时令、心绪都可必其为此行所作。”并在此诗下引孟《人日登南阳驿门亭子怀汉川诸友》诗，认为孟此行经过南阳，且在南阳度岁，人日登楼怀故乡诸友。笔者认为，《人日登南阳驿门亭子》诗非归途中诗。诗云：“朝来登陟处，不似艳阳时。异县殊风物，羁怀多所思。剪花惊岁早，看柳讶春迟。未有南飞雁，裁书欲寄谁？”无一句言及行旅之事。诗末慨叹“未有南飞雁，裁书欲寄谁”。如是自京洛归来，途经南阳，不日可至襄阳，不至发此深沉慨叹。且依谭文观点，此诗与《南南北北阻雪》诗为同时作品，则两诗心绪差距太大，一为“十上耻还家”，一为“裁书欲寄谁”，不知作何解释？《人日登南阳驿门亭子》诗应为他时羁旅南阳不得归家而作，与此行无关。而《南南北北阻雪》诗亦非途经南阳之作。据此诗一题《南归阻雪》看来，《南南北北阻雪》诗题误矣！误在把“归”字当作了“阳北”二字（竖写）。诗云：“我行滞宛许。”考《旧